

复旦大学历史系
建系八十周年论文集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切问集】

上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历史系

建系八十周年论文集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切问集】

上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 序

当一九二五年复旦大学新设史地学系,已在复旦创校二十年以后。

起初复旦公学没有专设史地科,那不是公学创办人的过错。相反,由马相伯老人手订的震旦、复旦两校章程,可知从建校伊始,凡攻读政法文商各科的学生,从备斋即预科二年,到正斋即本科三年,年年要把历史、地理当作必修课程,区别在于预科的本国史地用汉语讲授,本科的西国史地用英法等西语讲授。这正表明马相伯的卓识,他很早就把中外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程,列为“大文科”学生人人必读的通识教育项目。

因此,论系龄,复旦历史系年方八旬,但说到历史学在复旦成为中西兼备的现代性学科,便应说与百年复旦同步诞生。

用不着重述,史地在复旦自成一系,也与复旦从民国到共和国的命运一样,备历曲折。先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旦、暨南两校史地系合并,号称东西二周的周予同、周谷城两大教授轮流执掌系政,吸引青年俊彦任教和就学。接着共和国在一九五二年进行院系调整,复旦的文理诸系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已更名历史系的本系,得到江浙多所大学的著名史家加盟,顿成东南史学第一重镇。

怎么见得?不妨略举院系调整后复旦历史系的教授阵容。除二周外,本系的教授,在中国史方面,有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等;在世界史方面,有王造时、耿淡如、陈仁炳、朱激、章巽、田汝康等。还有当时已脱颖而出的中青年史家,如程博洪、张荫桐、胡绳武、赵人龙、金冲及等等。

人所共知,一流的综合大学,基础在于人文、社会、自然诸学科,都拥有一流学者。一九五〇年代复旦的人文学科,主要是中文、外文和历史三系。三系均托院系调整之福,各自都集合了本领域的知名学者和



年轻俊彦。例如历史系当时集合的老中青三代教师,无论在过去或在未来,大半都是学界公认的通人或专家,当然便使本系擢居海内一流。

毋庸讳言,由于种种非学术的原因,本系也常受人才流失之苦。二周主系均爱才若渴。周谷城教授曾回忆院系调整期间,他设计走“夫人路线”,使谭其骧教授等名家同意来复旦任教。周予同教授更在那时,得知陈守实教授应北师大校长侯外庐之邀,同意前往任教,行李已经运往上海火车站。他闻讯追往车站将陈教授劝回。周予同常惋惜,他没能留住顾颉刚,没能阻止马长寿、胡厚宣调离,虽非已咎,却使本系大受其损。

也用不着详述,从反右到文革,越来越激烈的政治运动,使复旦历史系怎样遭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宿命。一九六〇年代初,周扬率高教文史教育评估组,对北大、复旦文史二系进行评比,以为复旦历史系可居鳌头。岂知这正种下了复旦历史系发生两极分化和激烈内斗的诱因。待到十年浩劫过去,复旦历史系早已满目疮痍,非复旧貌。

所幸老成未尽凋谢。周谷城、谭其骧、蔡尚思、程博洪、张荫桐、田汝康,乃至卧病失明的周予同,摘掉旧帽的吴杰,转系任职的杨宽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本系拨乱反正做出贡献。于是本系历尽劫波,在中外史学的若干领域,仍能继承传统,而且有所创新。

谚云三十年为一世。回顾复旦历史系建系以来,不过八十年,但从主导本系教学和研究的取向来看,改易更化,即谓已历十世,也不过分。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文革结束已逾四分之一世纪,复旦历史系的总体取向,是向上的。所谓向上,涵泳传统的继承和开新。时移势变,复旦历史系再度分化成三系一所(历史、文博、旅游三系和历史地理研究所),留给历史学系的,是被边缘化的态势。

所谓绝处逢生吧,史学不再成为政治运动的首要冲击对象,在权力者任其自生自灭,反而使本系同仁如释重负,除本科生教学仍需中规中矩外,个人研究已经无拘无束。

正因如此,所谓年龄不饶人,复旦历史系昔称中青年的教授,在近四分之一世纪,也陆续离休和退休。时值建系八十周年,在文革后风靡本系讲坛的教授们,如今大部分已在安养颐年。或谓人文学者越老越成熟。这未必可称通例。但本系的离退休教授,多半尚年方“耳顺”,距“从心所欲”的古稀之年尚远。他们不甘寂寞,在离退休以后仍笔耕不辍,有的甚至因发挥“余热”而扬名海内外。还有若干教师调出了历史



系,但历史系永远记住了他们。谁都承认历史学有其历史。我们回顾复旦历史学的百年史,或者复旦历史系建系的八十年史,当然不能忘记曾为今日复旦历史系的教学和研究,奠定基石或添砖加瓦的前辈和同辈的学者们。本论文集的上卷便收入了历史系已经故世以及尚健在的离退调教师的代表作。所收篇目,凡健在者均由其本人提供,而对已去世的本系专家,由编者代选一篇足以代表其学说的论著。

至于历史系在职教师,无论耕耘史坛多年的著名学者,还是执教不久的年轻博士,是当下和今后历史系各项工作的直接承担者,本论文集下卷收入了他们各自提供的作品。虽然各篇之间学术水准难免有高下,但都是传承和光大复旦史学传统的不懈努力的结果。

今天复旦历史系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几乎无人完整知晓系史,那些道听途说的传闻,往往辗转传播,以致误差与实相并存。本论文集中所有的作品均已经正式发表,是业已得到社会认可的学术结集,可视为建系八十年来复旦历史系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客观缩影。此外,由于在前半个世纪,北大、复旦两个历史系,在中外学者看来,堪称中国史学的表征,因而我们编选这部论文集,格外审慎。我们请求尚健在的各位教师,提供自认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便是为了展现本系的历史进程。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五年前,本系曾编有《笃志集》作为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时至今日,环视南北东西,各家都在争胜学苑鳌头。我们把即将面世的八十年系庆文集起名《切问集》,旨在重申严谨治学为立系之本,并把这本集子作为复旦史学虽步履维艰但仍矢志求索的一个缩影,以就教于学界诸同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2005年8月



DEDICATED TO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FUDAN UNIVERSITY

谨以此书献给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80周年

目 录

— 中国古代史编

-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顾颉刚/3
- 《明史稿》考证 陈守实/33
- 王莽改制与经学中的今古文学问题 周予同/54
- 什么是史学史? 耿淡如/64
- 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 周谷城/72
- 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 王造时/78
- 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 马长寿/86
- 《〈宋史·刑法志〉考正》序 邓广铭/93
- 明清间译著底本的发现和研究 方 豪/101
- 中国历代政区概述 谭其骧/109
- 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 ... 胡厚宣/118
- 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 杨 宽/157
- 宋、元时代的海上交通 章 巽/173
- 郑和海外航行与胡椒运销 田汝康/186



- 试论邺都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
古都史上的地位 邹逸麟/197
- 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 袁锡圭/208
- 唐人的饮酒习尚与酒令 徐连达/238
- 从青铜器铭文看西周的战争 吴浩坤/255
- 董仲舒“天人之际”论初探 贺卓君/266
- 佛学初传与中国佛教的建立 唐玉田/278
- 唐代方伎之士与科学文化
——读《旧唐书·方伎传》 许道勋/285
- 豪杰其才 圣贤其行
——评于谦为国为民的英雄业绩和
高尚品德 汤 纲/295
- 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 赵克尧/306
- 顾从礼与上海城墙 杨正泰/323
- 论唐代使职的功能与作用 薛明扬/332
- 杞国的立国及其迁徙地望考 魏嵩山/342
- 法门寺佛经的收藏、发现及价值 柏 明/349
- 试论明代汉民族与海外各国的交往 ... 邢蒂蒂/369
- 重评“让步政策”
——兼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刘根良/377
- 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舞台
——纵论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演变的作用 周源和/386
- “序”非“饰”介
——与阎万钧同志商榷 陆惠鸿/401

- 评介《蔡元培年谱长编》 蔡尚思/407
- 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 汪 熙/409
-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 胡绳武/451
- 试论 1901—1905 年清政府的“新政” 王邦佐/468
- 林乐知与《中国教会新报》 陈 绛/479
- 论方志的继承和创新 黄 苇/493
- 黄兴与长江革命 陈匡时/507
- 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
问题 余子道/514
- 徐铸成就是徐铸成 邵嘉陵/535
- 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的抗法保台策略 ... 季云飞/540
-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 李华兴/552
- 1937—1945: 日伪对以上海为中心的
华中沦陷区的物资统制 黄美真/568
- 上海城市民众和上海小刀会起义 沈渭滨/592
- 论冯玉祥治军思想的演变 刘其奎/613
- 论辛亥革命前后刘师培的政治思想 ... 李妙根/624
- 毛泽东挺进中原战略决策的形成及其
特点 王世根/643
- 汪伪政权的覆灭与汉奸的审判 张 云/653
- 关于王造时等人的“致斯大林的
公开信” 何碧辉/668



- 日本战后财阀的被迫改组及其局限性 ... 吴 杰/675
- 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及其历史地位 ... 伍贻康/687
- 《伯尔尼游记》的再评价 张荫桐/698
- 论“民本政治”观与“民主政治”观的
历史形成 庄锡昌/707
- 论美国革命的特点 黄瑞章/716
- 里约热内卢军事条约的签订和美洲
国家组织的建立 程博洪/723
- 亚历山大帝国的兴亡 李春元/756
- 对印度现代化模式的几点探索 袁传伟/763
- 西方殖民者在河套、鄂尔多斯等地的
罪恶活动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
一个实例 戴学稷/774
- 中美洲一体化的发展轨迹及其前进中的
困难 方幼封/811
- 论马岛之战 赵长华/820
- 韩国姓氏源流考
——中韩姓氏文化比较研究 牟元珪/837
- 墨西哥整顿国营企业的做法和启示 ... 陈才兴/850
- 西博尔德的日本研究及其国际影响 ... 赵建民/859
- 全球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拉美文化的
独特性 刘文龙/871





DEDICATED TO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FUDAN UNIVERSITY

谨以此书献给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80周年

—

中国古代史编



顾颉刚(1893—1980),男,江苏苏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复旦大学史地学系教授。著有《三皇考》(合著)、《古史辨》(一、二、三、五册)、《史林杂识》、《秦始皇帝》等。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周易》这部书,用了汉以后人的眼光来看它,真是最古的而且和“道统”最有深切关系的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演卦的是伏羲,重卦的是神农(也有人说是伏羲,也有人说是文王),作《卦辞》、《爻辞》的是文王(也有人说是周公,也有人说是孔子),作《彖传》、《象传》等的是孔子;所有的经和传都出于圣人的亲手之笔,比了始于唐、虞的《尚书》还要古,比了“三圣传授心法”的《尧典》和《禹谟》还要神圣。

倘若我们问起他们的证据来,他们便可指了《系辞传》的话而作答,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是伏羲画卦的证据。又: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这是神农重卦的证据。因为《益》的卦文为䷩,是《震》和《巽》两卦叠起来的,如果神农不重卦,他就不能取了《益》的卦象而作耒耜了。又: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 本文原载《中国近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这是文王作《卦辞》和《爻辞》的证据。因为《系辞传》中说到包牺、神农、黄帝、尧、舜，只说他们观了《易》象而制器，没有提着《易》辞；这里既称“文王与纣之事”，又云“其辞危”，可见《卦、爻辞》定是文王所作的了。又：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这是孔子作《彖传》、《象传》等等的证据。因为《论语》里边称孔子曰“子”，称他的话为“子曰”，这里记载相同，可见《系辞传》是孔子的话而门弟子笔记的；至于《彖传》、《象传》不称“子曰”，则直是孔子手作的。

其它，说伏羲重卦的，其证据在《周礼》的“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书”和《系辞传》说的圣人作书契取象于《夬》；盖伏羲为三皇之一而已有书，足征他已经取象于重卦的《夬》了（孔颖达说。其实他不必要这样的转弯抹角，《淮南子·要略》篇已明言“伏羲为之六十四变”了）。说文王重卦的，其证据在《史记·周本纪》的“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说周公作《卦、爻辞》的，其证据在《左传》昭公二年，晋韩起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了《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因周礼为周公所制，故《易象》所系之《卦、爻辞》，应为周公所作。说孔子作《卦、爻》的，其证据在《史记·周本纪》、《日者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扬雄传》，《论衡·对作》篇等都说文王重卦，没有说他作《卦、爻辞》，而《艺文志》所说的“人更三圣”，韦昭《注》以为伏羲、文王、孔子；既伏羲只画卦，文王只重卦，则《卦、爻辞》自然是孔子所作的了（康有为说，见《孔子改制考》卷十）。

此外，又有说《卦辞》为文王作，《爻辞》为周公作的。他们以为《系辞传》中既说“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文王之有辞自无疑义，但《升》的爻辞言“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明夷》的爻辞言“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都不应预言。《左传》中既于《易象》言“周公之德”，则《爻辞》当是周公作的，文王仅有《卦辞》而已。（《系辞传》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文王囚羑里固为忧患，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前人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盖以父统子业之故）这是调停《系辞传》与《爻辞》内容冲突的一种解释（详见《周易正义》卷首，孔颖达引马融、陆绩等说）。

以上许多理由，从我们看来，直如筑室沙上。他们所根据的只有



《系辞传》、《左传》、《史记》、《汉书》等几部战国、秦、汉间的书。他们用了战国、秦、汉间的材料，造起一座从三皇直到孔子的《易》学系统。不幸，战国、秦、汉间人的说话是最没有客观的标准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大家在这种书里找寻著作《周易》的证据，说来说去总不免似是而非；除了伏羲画卦和孔子作《易传》而外，聚讼到今天，还都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伏羲画卦和孔子作《易传》的话，从我们看来，也何曾有坚强的根据。神农，已是起得够后的了，他到了战国之末方始在古帝王中占得一个位置；伏羲之起，更在其后，简直是到了汉初才成立的：当初画卦和重卦的时候，他们这些人连胚胎都够不上，更不要说出生了。此事说来话长，当另作《三皇五帝考》一文论之。至孔子作《易传》，《系辞传》中似乎有一段很好的话足以证明：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

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这里所谓“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即《论语·先进》篇中的“回也其庶乎”；这里所谓“有不善……未尝复行”，即《论语·雍也》篇中的“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系辞传》的话和《论语》所云这样地密合，足见“子曰”的“子”实是孔子。但是，我们倘使懂得了战国、秦、汉间人的攀附名人的癖性和他们说话中称引古人的方式，就可以知道这是易学家拉拢孔子的一种手段。《礼记》里，《庄子》里，这类的话正多着呢。如果不信，那么，孔子既经引了《复卦》的爻辞来赞美颜渊，为什么《论语》里却没有这一句？就使退一步，承认《系辞传》里的“子曰”确是孔子的话，也不能即此证明《彖传》和《象传》等是孔子所作。为什么？因为《彖传》等的著作，孔子自己没有说，孔子的门弟子也没有说，连《系辞传》也还没有说。

这种事情的问题还不小，一部《周易》的关键全在《卦辞》和《爻辞》上：没有它们就是有了圣王画卦和重卦也生不出多大的意义，没有它们就是生了素王也做不成《易传》。所以《卦、爻辞》是《周易》的中心。而古今来聚讼不决的也莫过于《卦、爻辞》。究竟这两种东西（也许是一种东西）是文王作的呢？是周公作的呢？是孔子作的呢？这是很应当研究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弄清楚了它的著作时代，才可抽出它里边的材料（如政治、风俗、思想、言语……）作为各种的研究。

现在，我先把《卦、爻辞》中的故事抽出来，看这里边说的故事是哪几件，从何时起，至何时止，有了这个根据再试把它的著作时代估计一



下。因为凡是占卜时引用的故事总是在这个时代中很流行的，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的。例如现在的签诀，纸条上端往往写着“伍子胥吴市吹箫”，姜太公八十遇“文王”，“韩信登坛拜将”，“关云长秉烛达旦”……的故事，就因为这些故事是习熟于现在人的口耳之间的，只要说了这件故事的名目便立刻可以想出它的涵义。但也有不直称一件故事的名目而就叙述这件故事的内容的，例如《牙牌数》中的一条说：

三战三北君莫羞，一匡天下霸诸侯。

若经沟壑殉小节，盖世功名尽射钩。

我们如果不读《左传》和《论语》或《列国志》，便不能明白它说的是曹沫和管仲的故事。《周易》的《卦、爻辞》的性质既等于现在的签诀，其中也难免有这些隐语。很不幸的，古史失传得太多了，这书里引用的故事只有写出人名地名的我们还可以寻求它的意义；至于隶事隐约的则直无从猜测了。所以我做这个工作决不能做得完满，我只想从这些故事里推出一点它的著作时代的古史观念；借了这一星的引路的微光，更把它和后来人加上的一套故事比较，来看明白后来人的古史观念。这两种观念一分明，《周易》各部分的著作人问题也许可以算解决一半了。

一、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

丧羊于易，无悔。（《大壮》六五爻辞）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旅》上九

爻辞）

这两条爻辞，从来的《易》学大师不曾懂得，因为《周易》，成为圣经的时候这件事已经衰微了，不能使人注意了。《象传》，于《大壮》说“丧羊于易，位不当也”，虽很空洞，还过得去；于《旅》说“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说得含糊得很，实使人索解不得。王弼注云“以旅处上，众所同嫉，故丧牛于易，不在于难”，这是把“易”字当作“轻易”讲的。朱熹注云“‘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觉其亡也；或作‘疆场’之‘场’，亦通，《汉书·食货志》‘场’作‘易’”，则他虽维持王说，也疑其是地方了。

自从甲骨卜辞出土之后，经王静安先生的研究，发现了商的先祖王亥和王恒，都是已在汉以来的史书里失传了的。他加以考核，竟在《楚辞》、《山海经》、《竹书纪年》中寻出他们的事实来，于是这个久已失传的故事又复显现于世。今把这三种书里的文字抄录在下面：

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



经·大荒东经》)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郭璞《山海经注》引《真本竹书纪年》)

该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楚辞·天问》)

静安先生谓《天问》中的“有扈”乃“有易”之误，因为后人多见有扈，少见有易，又同是夏时事，所以改写的。又谓“有狄”亦即“有易”，古时“狄”“易”二字本来互相通假，其证其多。于是断之曰：

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顾刚按：此用《今本纪年》说)，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顾刚按：《吕氏春秋·勿躬》篇云：“王冰作服牛。”静安先生谓篆文“冰”作“欠”，与“亥”相似，“王冰”亦“王亥女”之误)即发见于此。有易之人乃杀王亥，取服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仇，故为之不宁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有了这一段说明，于是这个久被人们忘却的故事便从向来给人看作荒唐的古书里钩稽出来了，这真是一个重大的发见！

既经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大概，再来看《大壮》和《旅》的爻辞，就很清楚了。这里所说的“易”，便是有易。这里所说的“旅人”，便是托于有易的王亥。这里所说的“丧羊”和“丧牛”，便是“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也即是“有易杀王亥，取仆牛”。这里所说的“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便是“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也即是“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



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想来他初到有易的时候曾经过着很安乐的日子,后来家破人亡,一齐失掉了,所以《爻辞》中有“先笑后号咷”的话。如果《爻辞》的作者加上“无悔”和“凶”本项故事为有意义的,那么可以说,王亥在丧羊时尚无大损失,直到丧牛日才碰着危险。这是足以贡献于静安先生的(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在厦门草此文,甚快,欲质正静安先生,旋以校中发生风潮,生活不安而罢。今日重写,静安先生之墓已宿草矣,请益无由,思之悲叹)。

还有一件事情应当注意的。《吕氏春秋》说“王冰作服牛”,《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大荒东经》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天问》说“焉得夫朴牛”,静安先生已证明“王冰”与“胲”之即王亥,“仆牛”与“朴牛”之即服牛,而云:

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顿刚按:此与奚仲作车俱见《世本·作》篇),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然则王亥祀典之隆(顿刚按:卜辞中祭王亥之牲用三十牛,四十牛,以至三百牛),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女之传说胥由是起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这个假设很可能:一个人若没有特别使人纪念的地方便不能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但他说“周、秦间之传说胥由是起”,这句话却有应商量之处。因为这个传说从商初起,直到周、秦,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是无疑义的,不能说至周、秦间才起来;而且这个传说传到了周、秦之间,已成强弩之末了,除了民间的流传以及偶然从民间微细地流入知识界之外,操着知识界权威的儒、墨、道诸家是完全忘记的了,不理会的了。所以《系辞传》中便说: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它已把“服牛乘马”的创作归到黄帝、尧、舜的名下去了!三国时的宋衷,他注释《世本》,见有“胲作服牛”之文,又不敢违背《系辞传》中的话,便注道:“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宋罗泌作《路史》,又因宋衷业已说明胲为黄帝之臣,便在《疏仡纪》中写道:“黄帝……命马师皇为牧正,臣胲服牛始驾,而仆蹕之御全矣。”倘使静安先生不作这番爬梳抉剔的工夫,胲是做定黄帝时的人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只